

工人议政 简史

民主的细节和劳动者的力量

文 | 本刊记者 李瑾





2019

年3月,北京。

人民大会堂,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会场。

在连续四年不懈呼吁为职业技能培训立法以后,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终于不用再提这个“老建议”了,因为此前的建议“有了实质性回应”,全国人大将就《职业技能开发法》的立法工作开展调研。

同样不用再继续再提“老建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还有连续6年呼吁修订《职业教育法》的赵郁。就在此次人代会召开前5天,他应邀参加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组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有望在年内实现上报。

尽管大名鼎鼎,许振超的身份依然是青岛前湾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队队长,赵郁的身份依然是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汽车装调高级技师。

四年,许振超,《职业技能开发法》制定。

六年,赵郁,《职业教育法》修订。

在中国最高层级的民主政治殿堂,两位一线工人代表为劳动者权益的执著表达,留下了又一段工人议政的故事。

民主的细节,劳动者的力量,每一年,每一天,都在改变中国。



1980

为改革助威

.....

65年前的1954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期14天的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同时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5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中国工人》记者查询史料发现,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共有1210人,其中包括孟泰、马恒昌、马万水、马六孩、梁军等开国劳动模范。



限于特定的历史氛围,当时的新闻媒体鲜有人大代表议政的细节报道。来自基层的一线工人代表,往往出现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中。

时光荏苒,“文革”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间”。

1980年8月3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但是,与今天的全国两会“新闻大战”相比,当时的新闻报道总量不多,且多为程序性报道。

为期12天的这一次人代会,《工人日报》仅在会期最后3天开始出现有关工人代表的报道。其中,记者陈蓓、铁英采写的通讯《人代会上气象新——访五届人大辽宁工人代表》里,出现了多位工人代表的名字。

闭幕次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陈蓓采写的另外一篇报道,题目为《“三废”不处理,四化难建设——湖北省工业战线的人大代表吁请有关部门解决污染问题》。

在这篇报道里,陈蓓记录了江岸车辆厂工人副总工程师范忠志代表的小组发言——我是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讲话,为人民办事。“在他(范忠志)面前,摆着数封群众寄来的挂号信,是委托他向大会反映情况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是一线工人代表参政议政的声音第一次出现在“自己的报纸”上。从这一年开始,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逐渐从无到有。

1981年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2月15日,《工人日报》第三版刊出了出席人大、政协会议的部分劳模在全国总工会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其中,南京师院附小特级教师斯霞代表建议“为四化建设培养合格人才”,河南郑州国棉六厂挡车工孙景荣代表建议“抓好对青工的传帮带”,木工出身的重庆钢铁公司副总工程师黄荣昌代表建议“技术改造要走自己的路”。

1983年6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当日,湖南涟邵矿务局采煤工易政求头顶矿灯的照片,刊登在《工人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此后的十余天里,一线工人代表的声音被大量传递出来,密集程度前所未有。



第一屆人代會部分代表合影

“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这是云南一家两代工人代表的“交接嘱托”，也成为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一段佳话。

火车司机尹自昌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22岁的女儿尹丽凡是楚雄丝绸厂的青工，这次当选为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女儿来京之前，父亲“嘱咐又嘱咐”——咱一家两代工人，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只有在咱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人才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啊！你一定要虚心向其他代表学习，认真参与国家大事，让革命长辈们看到，你们不愧是新中国的新一代主人。

这是改革风起云涌的年代，利益在调整，阻力在出现。1984年5月，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和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先后开幕。12位一线工人代表的图片和发言，同时出现在中央报纸的第一版上，并被冠以“站在时代前列，做改革的主力军”的总栏题。

从“改革增强了我们的责任感”到“养路工完

全可以搞承包”，从“上海工人在盼望改革”到“搞改革更要重视技术创新”，从“工人要尊重知识分子”到“工人要关心生产和经营改革”……来自改革最前沿的一线工人代表发出的声音，成为支持改革的最强烈呐喊。



在全国政协会议的会场上，北京市第六建筑公司老工人王学礼发出了更强烈的改革呼声——“改革要彻底，一定要同步进行！”

尽管大家都说好，六建公司的改革方案一直批不下来，这是让王学礼“皱起眉头”的事情。在进行承包试点的装修队，原本一个半月的活儿，不到一个月就按质按量完成，却因为管理制度还没有改革，工人积极性仍然受到影响。

王学礼直言：“我们这个有一万多人的公司，连买茶叶的自主权都没有，开竣工更没权了，都得等着总公司批……捆着这么多绑，这能搞好承包吗！”

……

年复一年,届复一届。工人议政的声音逐渐强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来自生产一线的声音,带着火热的激情和梦想,直击繁冗的拖沓和束缚,粗朴而有力,为正在进行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线工人代表的比例问题浮出水面。

议政 1993 为企业呐喊

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来自大会新闻中心的数据显示,人民选举出的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身份是工人的代表有300多人。他们带着身边工友的重望,踏上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40级台阶。

在北京的每一天,侯振清都处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之中。胸前的那张红色代表证,让这位开滦赵各庄矿回柱班班长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之重。

毫无疑问,壮观的万人大礼堂让那些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工人代表震撼不已。扇形面的礼堂分为三层,坐在哪一层的哪一个位置,都能够清晰地看到主席台。穹窿形的会场顶部,红宝石般的巨大红色五角星灯置于中央,周围是鎏金的70道光芒线和40个葵花瓣。

此前,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党的发展历史上的伟大

创举。

这种彻底突破思想藩篱的巨变,让刚刚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一线工人们挣脱了拘谨。

在北京的每一天,侯振清都处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之中。胸前的那张红色代表证,让这位开滦赵各庄矿回柱班班长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之重。

出发之前,工友们送给侯振清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翻开笔记本,第一页上端端正正地写着“认真讨论国策”6个字。这些在井下摸爬滚打的兄弟们说:“你放心去开会吧,把我们的呼声反映上去。你的工作量,大家帮你赶出来!”

从轰鸣的机器旁边走来,从遥远的矿井深处走来,每一位工人代表都觉得自己的身后,有千双工友的眼睛。

“为企业松绑”,这是这一届一线工人代表共同的呼声。从宏观调控到微观调控,从转换机制到转变职能,从产权理论到股份模式,多年服务会议的工作人员发现,“工人代表参政议政能力越来越强了”。

一到北京,来自淮北煤矿建设公司30工程处的陈登明代表就整理出一份建议书,希望政府为“国家队”走向市场创造条件。

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陈登明发出这样一连串的诘问——“14项企业自主权,现在到底落实了多少?有的县长已经坐上了‘奔驰’,国家建设资金为什么却不能按时到位?企业贷款生产,工人们劳作一年的利润都交给了银行,企业发展从何谈起?”

引人注意的是,包括陈登明在内,细心的工人代表注意到人大代表构成百分比的变化。他们在翻阅名册后直言不讳:“工人代表的比例越来越小了。”

1993年3月20日,《工人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的通讯《工人代表在想什么》,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

1978年的五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26.7%。

1983年的六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4.9%。

1988年的七届人大,工农代表合计比例占23%。

1993年的八届人大,工人代表比例占11.15%。



从26.7%到11.15%，15年里形成的这条下降曲线，让工人代表们感到困惑和忧虑。

在经济体制改革渐成风尚的时代，他们支持扩大企业经营者的全国人大代表比例，但同时反复强调工人代表的比例不能继续降低，“否则，来自生产一线的真实呼声会越来越弱”。毕竟，如果职工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市场经济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发展动力。

尽管这一届工人代表的比例有所下降，他们所展现出的议政能力却赢得了广泛赞誉。

2977名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只有慈成禄一个人是养路工，代表着100多万养路工人群众。这位河北廊坊葛渔城道班班长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来到北京，但既然佩戴上鲜红的代表证，就要用好手中的政治权利。

第一次参会，慈成禄就要给《政府工作报告》提一条意见。他说：“报告有关公路建设的段落，只讲了‘修’，没有提‘养’。这种投资取向需要仔细研究，应该是‘修养并举’啊！”

慈成禄用葛渔城道班的“小账”算起国家的“大账”。他和24位工友养护的公路中，有7.8公里路段已经“超期服役”15年，因为养护得力没有每隔5年进行翻修。仅此一项，就为企业节约300多万元。“如果全国的公路养护工作都搞好了，至少要节约几十个亿！”

或许在有些人眼里，工人议政不过是提出几份意见和建议。然而，恰恰是这些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声音，往往更符合企业发展和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2007年3月20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刚刚闭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不会有多少人想到，这家最终成为中国第五大银行的金融机构，与一位工人代表提出的议案有过交集。

14年前，吉林省汪清县邮电局揽储班班长李桂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人代会，这位普通的一线工人便大胆建议成立邮政系统专业银行。为了这份议案，她专门跑到北京的邮电网点征求意见，四处游说人大代表签名响应。

今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标识散布在城市和乡村，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正式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近4万个营业网点，5.65亿个人用户，电子渠道与实体网络互联互通，线下实体银行与线上虚拟银行齐头并进，全业态的金融服务格局让这家银行生机盎然。

今天，借助互联网强大的搜索引擎，我们依然无从查找李桂菊的下落。剔除同名同姓者，她的名字仅仅出现在百度百科“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词条中。当然，26年前已经泛黄的报纸上，留下了李桂菊的议政故事，成为一段显示劳动者智慧的传奇。



2008年3月1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会后，全国人大代表康厚明、胡小燕和朱雪芹（自左至右）在一起交流

议政 2008 为群体亮相

当李桂菊庄重地提出自己的第一份议案的时候，17岁的朱雪芹还在苏北睢宁的一处农家，好奇地观望着日新月异的外部世界。

一年以后，这位倔强的女孩子决然地扛起铺盖，在父母不舍的目光中离开乡野，走向全然陌生的城市，成为浩荡流动大军里的一名农民工。

此时，发源于17年前的人口流动大潮，已经孕育出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的标签背后，不仅是身份、岗位和生活上存在的不平等，更是四处可见的



2013年3月1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

使用歧视、管理歧视、经济歧视和人格歧视。

几乎从进入工厂和城市的那一天开始，农民工就成为资本和劳动力博弈格局中的弱势一方，合法权益接连不断地受到侵害。由于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住工作地分离，他们的公民权利无处行使，政治权利和话语平台陷入盲区，无从依靠政策博弈改变自己的弱势命运。

幸运的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运行架构无法忽略这样庞大的群体。尽管此时的朱雪芹还在生产线上劳作，工人议政的大门却已经悄悄地向她打开。

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用2000字的篇幅，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说明。

盛华仁说，“我国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全国人大中也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历史航行的巨轮，就这样又一次驶入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2008年1月，继农民工胡小燕、康厚明先后当选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后，朱雪芹的名字出现在上海市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64人名单中。

从苏北到上海滩，农民工朱雪芹用了13年的时间完成了人生的逆袭。消息传到老家，她的父母喜极而泣。

3名农民工代表，成为2978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耀眼明星。

2008年3月，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联袂亮相，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身份走进人民大会堂。

聚光灯前，多少有一点忐忑。讨论会上，难免有几分稚嫩。但是，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他们依然努力表现出“最完美的自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朱雪芹特意穿上了浅灰

色的职业套装。她说自己愿意用这种方式让工友们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同样有趣的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认真听完胡小燕的发言后,转头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这个代表选得好,你们看她讲得多慷慨激昂。”

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期间,朱雪芹领衔提出11份议案,先后提出14份建议。这些议案和建议,涉及农民工社会保障异地转移、农民工子女入学入托、农民工养老及完善劳务派遣等,“农民工的权益表达”成色十足。



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就连最苛刻的西方记者都不得不承认,让农民工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表达利益诉求,中国民主政治的这次伟大尝试获得了成功。

毫无疑问,3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通过了“党和人民的大考”。面对中国农民工阶层日益壮大的现实,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数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普遍共识。

5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透露,本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农民工代表31位。

彼时,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2.6亿,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依然还是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收入、住房、社保、就医、子女上学等方面都遇到障碍,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与城市居民有着较大差距。

完成一届任期后,3位第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

代表去路迥异。

康厚明落户重庆,完成了自己人生赛道上的身份转型。但是,按照他的表述,“工作性质、环境都没变,自己感觉还是农民工”。很快,康厚明有了另一个身份——党的十八大代表,他也是26位农民工身份党代表中的一位。

胡小燕落户佛山,成为了一名公务员,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通道正在打开。

没有了胡小燕和康厚明的相伴,落户上海并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朱雪芹并没有感到孤独,因为还有30位新的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和自己站在一起。

环卫工王月清,保安员朱良玉,保洁员陈腊英,营销员张晓庆,物业管理员曾香桂,洗脚妹刘丽……每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后,都是一支庞大的外来务工者大军。

今天的中国,利益群体的多元化成为重要社会特征,不同群体利益的差别性与同一群体利益的一致性,需要借助协商才能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平衡。

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个平台上,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和参与,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现状的客观要求,更是党和政府培育新生群体政治力量的需要。

新一代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上,依然保留着朱雪芹当选那个年代的印记——出身农村,进城打工,从最普通最辛苦的岗位起步,努力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优等生”。

每一次人大会议上,都有更多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民意空气”吹拂到会场,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未来成长的政治空间带来无数想象。



**2010年代
走向利益表达……**

“仿佛春风拂过的劲草,扎根‘中国式民主’的大地,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国家通讯社发出的这一段评论,恰恰也是工人议政的生动

写照。

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1210名全国人大代表齐聚一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得以正式确立。

几近一个甲子，民主的种子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根深叶茂。

从“拥护报告”到“建言献策”，越来越多的工人代表不仅关心国家和企业，更开始直视自己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表达。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五位一线工人代表自曝“生活压力账本”，疾呼“职工收入增长提速不能一拖再拖”，把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端向前台。

3月6日，前来参加人大会议的内蒙古包头公交运输集团驾驶员张凤霞，无意中露出袜子上的破洞，让在场采访的记者顿时愕然。

这是利益表达时代下的一次典型性工人议政。5位工人代表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愿意直观描述自己略显尴尬的生存状态，用来凸显千百万工友共同的呼声和期盼。

随后，张凤霞、康厚明、王艳斌、杨晓霞、代朝霞等5位工人代表晒出了各自的家庭收支账，坦言“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还是太慢了”。

农工班班长康厚明16岁外出打工，31年积攒的钱，因为儿子上大学就接近“归零”。他直言发问：“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教育收费增长的速度？”

王艳斌最担心家人生病，因为生一次病就能花光她一年的收入。她直言发问：“环卫工人的收入增长，什么时候能够赶上医疗收费的增幅？”

张凤霞荣誉等身，工资却月月花光。她直言发问：“公交职工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物价的

增长速度？”

代朝霞每天重复分拣2万个弹簧的动作，在26万元买下一套二手房，负债13万元。她直言发问：“机械工人的工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房价的飞涨速度？”

杨晓霞每年为企业创效几百万元，工资依然是2000多元。她直言发问：“纺织工人的收入，什么时候能够赶上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在一连串的发问之后，这些工人代表“议政有方”。康厚明建议，要像城市职工那样，通过立法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利益。杨晓霞提出，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就是从另一个渠道提高了一线工人的收入。

“辣妹子”性格的代朝霞索性发出警告：“再这样下去，谁还愿意当工人？！”

这一次工人议政，把收入分配问题推上了前台。依照当时媒体披露，短短3年时间里，208家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从6.72倍扩大到17.95倍。养老和医疗保险参保率，城镇就业人员仅为62%和60%，农民工不足20%和31%。

5位一线工人代表的“生活压力账本”，不仅在人代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同时引起全国政协委员的强烈共鸣。来自全国总工会界别的张世平委员称：“5位代表的‘账本’，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真实收入和生活状况。”全国政协常委张俊九更是直言不讳，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问题长期被忽视。

5天以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乔传秀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完善最低工资制度，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低收入职工工资增长。

同日，全国总工会相关人士透露，全总正在积极影响决策，推动相关立法，以有利于广泛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促进包括工资条例在内的相关政策出台。

这是利益表达时代下的一次典型性工人议政。5位工人代表表现出足够的勇气，愿意直观描述自己略显尴尬的生存状态，用来凸显千百万工友共同的呼声和期盼。

与此同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建设性，不仅符合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要求，更和那些“雷





2010年3月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人雷语”形成鲜明反差，淳朴、真诚、奉献的阶级品质赢得了社会广泛尊重。

事实上，及时表达亿万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紧密相连，始终是工人议政的鲜明特点。

十二届全国人大期间，来自煤炭行业的多位一线工人代表形成接力式“建议”，持续呼吁“免征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个人所得税”。对于相关部委的回复，井下掘进工董林代表无论是书面和电话口头反馈中，都明确表示“不满意”。

人代会上，董林直言：“煤矿工人平均每人要承担3.5元以上的生活费用，家庭人均收入微薄，因此哪怕几十元的个税，都会是一个负担。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所得都可以免征个税，煤矿井下艰苦岗位津贴却非要计入纳税总额？”

当改革进入深水期的时候，平衡不同社会群

体的利益直接关联发展与稳定的大局。让底层利益诉求得到公平表达的机会，是社会公正和国家治理的重要体现，工人议政则是中国民主政治不同群体充分实现利益表达的生动缩影。

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改变着每一位有幸进入议政殿堂的劳动者。他们也把自己的执著和坚守，融入这份为亿万职工代言的事业。

从2015年起，进京参加人代会的许振超都是“工人代表聚会”的主角。每年一次，早已相熟的工人代表们抽时间交流，已成惯例。

2015年的聚会者是许振超、李斌和王钦峰。李斌是上海电气首席技师，王钦峰是山东豪迈机械公司技工。三位一线工人代表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技工、技术和中国工业制造。

这是许振超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第8年，他的角色代言人意识已经非常明确，围绕着工人合法权益每年都有相关建议，批评起来也不留情面。



“职业教育看上去很受重视，好几个部门在管，但最后都没管好。”

这一年，上海技术工人李斌带来的建议是加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工人和农民的名额，“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劳动者的创新积极性。”

2016年3月，沈阳鼓风机集团高级技师徐强和“火箭焊心人”高凤林，成为“工人代表聚会”新面孔。今天已经成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的高凤林，当时在政治场合寂寂无闻，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的呼声完全可以经由其他4位工人代表进行转达。

这次人代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了上海代表团审议。李斌在8分钟的发言里，引用了“只有1%的人想当工人，认为工人社会地位低的人占了九成以上”的数据，满座震惊。

李斌告诉大家：“我发言时，总书记用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新华网的报道则显示，习近平当场表示，要想办法调动一线工人、制造业工人、农民工的积极性，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工人阶级是主人翁，主人翁的地位要体现出来。

5个月，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全国总工会牵头相关部委开始研究制定《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可惜，李斌再也不能出现在这样的聚会上。2019年2月21日，58岁的李斌在上海徐汇中心医院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

从十一届全国人大开始，李斌一直连选连任，先后11次参加人代会，参加各类履职活动280多次。中国技术工人的命运，因为他的奔走呼喊变得更加光明。

“还在老地方吗？”

“还在老地方。”

“不容易啊，还继续在基层技术攻关。”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人代会上与李斌握手时的对话。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李斌，依然是一位一线技工。

李斌走了，“工人代表聚会”还将继续下去。工人议政，彰显“中国式民主”的优势，工人代表



2013年3月13日，全国劳模李斌、许振超、王钦峰（从右至左）三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油、鼓劲 杨登峰/摄

的履职故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 * * * *

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工人代表的又一个“人代会经典时刻”——

高级工人技师徐强告诉习近平：“几年前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没有被选上，很多人安慰我说，人家没喝你一口酒，凭啥选你？后来，我被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人间正道是沧桑。”

习近平回应，“没有基层一线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怎么体现”。

毫无疑问，来自基层一线的工人代表最懂得民生疾苦，最知晓政策得失，最能代表普通民众的意愿，最能反映社会基层的呼声。国家高层只有听到更多、更真实的民间声音，才能够真正关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事业。

聚沙成塔，涓流汇海。

今天，来自一线工人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国人大代表，已经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里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议政故事，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今天，工人代表的每一次利益表达，都构成了中国民主政治生活的生动细节。不同社会阶层的政策博弈，正在因为他们的出现变得更加公正和公平。❶





劳动教育需要更多的仪式感

无论是鸟巢的刻柱留名,还是伦敦的护送圣火,都是对劳动最好的尊重。

文|本刊记者 李瑾

北京,CBD商务区。

随着528米的“中国尊”全面封顶,中国最壮观的城市天际线横空出世。

这是北京市最高的地标建筑,地上108层、地下7层,可容纳1.2万人办公。

从2012年9月打入第一根地下桩开始,“中国尊”突破的每一米新高度都全城瞩目。从世界上第一个在抗震设防烈度8度区建造的500米以上超高层大楼,到世界首创的服务高度超过500米的跃层电梯,“中国尊”的每一个“世界之最”都成为劳动改变世界的最好诠释。

“中国尊”的建设过程中,全国政协委员、全总经费审查委员会原主任李守镇不止一次登上过这处超高建筑工地。为劳动者创造奇迹倍感骄傲的同时,他的内心也有深深的遗憾。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尊重劳动,加强劳动教育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重要课题。如果青少年的成人仪式放在‘中国尊’工地举行,或者把产业工人的入职仪式放在这里,这样的‘仪式感’是不是更有助于树立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的社会风尚?”

2019年全国两会上,李守镇说的这一番话,引起在场的全国政协委员的积极响应。

“鸟巢模式”需要广泛复制

11年前,北京城建集团国家体育场总承包部总工程师李久林的一段讲述,曾经让很多普通的技术工人热泪盈眶。

总用钢量11万吨的鸟巢工地,焊接成为关键

的控制环节。薄板焊接变形大,厚板焊接熔敷量大,加上高空焊接和冬雨季焊接的防风雨防低温难题,需要最优秀的焊接技术工人。

当时,全国1000多名优秀焊工接受培训,优中选优,闯过淘汰环节的人才能进驻工地。

鸟巢构件巨大,只能靠焊工调整姿势,在狭窄空间内进行操作。夏天,钢板要加热到150摄氏度以上,焊工穿着厚实的工作服,最长的焊接工序达到17个小时,技术、体力和责任心都面对挑战。

鸟巢建成了,这些焊工的名字被镌刻在钢柱上,四人一列,留下了自己的微痕。也许不会有多少游客注意到这个细节,但它日久天长地就在那里,仿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铁军,依旧守护着这幢世界级地标建筑。

在李守镇看来,这样的方式就是最好的劳动教育。这样庄重的仪式感向社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息——全社会都要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

李守镇说:“近年来,港珠澳大桥、丹昆特大桥、舟山港、‘复兴号’高铁等一大批超级工程震惊世界,神舟、天宫、蛟龙、天眼、北斗等一大批大国重器竞相问世。所有这些重大工程,无不体现着一线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遗憾的是,一些重大工程在成功验收后,大多数参与建设的劳动者与这些壮丽工程就不会再有交集。”

让李守镇记忆犹新的是,不仅有2008年北京奥运会刻有焊工名字的鸟巢钢柱,还有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欢迎火炬的建筑工人。

当时的电视转播画面上,作为英国的骄傲,五

届赛艇奥运冠军雷德格雷夫举着火炬，在万众欢呼声中跑进主会场。这一刻，通道两侧迎接火炬的500名“黄色安全帽”同样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他们正是参与伦敦奥运场馆建设的工人代表。

场馆建成以后，建筑工人早已撤离工地。然而，人们没有忘记这些无名之辈，在开幕时刻把他们请了回来，迎着全场艳羡的目光护送圣火进场。

李守镇说：“无论是鸟巢的刻柱留名，还是伦敦的护送圣火，都是对劳动最好的尊重。我们设立国家公祭日和烈士纪念日，在这样的日子举行纪念仪式，让爱国主义教育入脑入心，倡导全社会‘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也同样需要更多的仪式感，‘鸟巢模式’需要广泛复制。”

让劳动教育的仪式感多起来

2018年12月31日晚7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2019年新年贺词。

习近平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发力，继续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他向每一位科学家、每一位工程师、每一位“大国工匠”、每一位建设者和参与者致敬，向还在辛勤工作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以及千千万万的劳动者”道一声“辛苦”。

习近平的深情话语，让全国劳动者感到无比温暖。“全社会都应该尊敬劳动模范、弘扬劳模精神，让诚实劳动、勤勉工作蔚然成风。”他在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学员的回信中的谆谆嘱托，更是为新时代的劳动教育提出了方向和目标。

在出席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时，李守镇提出《切实增强劳动教育的仪式感》的提案，成为新闻媒体报道的热点，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共鸣。

家住北京冬奥会主场馆旁的李正荣教授就深有同感。冬奥会场馆施工的过程，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每天亲眼目睹着。他也曾为工人们需要精准对接钢材构建的技术惊叹过，也曾因为施工的噪音而心烦过。直到有一天，场馆围挡拆除，过去繁忙嘈杂的工地安静下来，他才突然意识到，“工人们撤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李正荣教授告诉《中国工人》记者，“正因为目睹见证过工人们夏日骄阳、冬日雾霾里从不间断的辛勤劳作，才从内心对劳动伟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可是，社会上很多人并没有崇尚劳动的意识，

还是对劳动没有基本的认识和尊重。”

在接受《中国工人》记者采访时，李守镇坦陈这个提案的由来是生活中的感受。

两会前夕，李守镇委员到首都新机场建设工地，再次被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所所震撼。“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去过很多气势磅礴的世界级建设项目。工人们像养活一棵树苗一样，把那么恢弘的建筑盖起来，竣工的日子，就是他们离开的日子，一点点劳动者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更别说有一个什么样的纪念馆或纪念牌了。”

李守镇介绍说，国外很多工地虽然也有围挡，但都会留下一处通透的观察口，社会大众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透过窗口观察劳动建设的情景，其实也是一种寓于平常的劳动教育。相比之下，我们的工地围挡往往是严严实实，路过的人们根本看不到工地里辛苦劳作的场面。

从工地的围挡延展开来，李守镇认为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切实增强劳动教育的仪式感。比如，在开学第一课、入团仪式、成人仪式、毕业典礼、校庆典礼等常规性仪式中，应当增加和突出劳动元素，邀请劳动模范、大国工匠等先进人物参加，引领青少年学生感悟劳动的魅力和意义，用劳动教育“立德树人”。

与此同时，劳动建设领域同样需要增加仪式感。李守镇建议，应当鼓励在新员工入职时增加爱岗敬业的宣誓仪式环节，从劳动者职业生涯的起点就增强职业认同，坚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在重大工程竣工等仪式中，应当留出专门环节聚焦参与工程建设的普通劳动者，并在相应位置设立纪念墙、纪念柱等，铭刻参建劳动者的信息，甚至可以为重大场馆参建者发放纪念铭牌，作为优先进入或减免票费的凭证。

尊重劳动不是纸面上的字眼。科学研究早已证实，生活中的仪式感容易让人刻骨铭心，特别是对于缺少劳动教育的青少年和青年工人而言，充满仪式感的场景更能触动他们心底的柔软，从而对劳动和劳动者产生最大的感激与敬意。

或许，即将在2022年举办的北京冬奥会，也会像伦敦奥运会一样，在开幕式上增设劳动者亮相环节，更可以邀请场馆建设者免费观看赛事。这个时刻，就是劳动和劳动者最有仪式感的“高光时刻”。

在中国最高层级的民主政治殿堂，
两位一线工人代表
为劳动者权益的执著表达，
留下了又一段工人议政的故事。
民主的细节，
劳动者的力量，
每一年，每一天，
都在改变中国。

摘自 NO.2/3 2019《工人议政简史》